

● 山东社会科学院成立40周年征文

(上接6版)

8. 主持省重点课题《山东省领导人才发展战略研究》

1987年初,我受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委托,主持《山东省领导人才发展战略研究》课题。1987年6月,这一课题被列为山东省“七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我撰写了课题总报告,提出构建我国领导人才发展战略必须坚持的目的性原则是:其一,能够充分保障祖国长治久安,每一个时期都能够选拔出优秀的领导人才治国,避免国家发生任何形式的动乱;其二,能够充分体现执政党的组织路线,有力贯彻党的政治路线,进而确保国家发展战略的实现;其三,能够充分体现人民民主,努力保障一切有领导才干的公民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干,不能压抑和打击人才。为了正确构建领导人才发展战略,必须广泛进行领导人才调查,注重发现人才,高中级领导机关建立各自的领导人才库;建立领导人才梯队,大面积培训和多种形式锻炼领导人才;适时把条件成熟的领导人才置于适当的领导工作岗位,有计划地对现职领导干部进行集中培训,丰富其领导知识,增长其领导才干。

1991年1月,山东省委组织部召开了“干部工作新方法研究课题评审会议”。评审委员会对本课题总报告的评审鉴定是:“本课题研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资料准确详实,研究方法科学。总报告在对我省地县两级领导干部队伍的历史演变和现状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领导人才发展的若干规律,提出了目前社会条件下领导人才生长的几种理想模式,基于上述理论,结合我省领导人才发展的具体实践,按照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要求,预测了到2000年我省地县两级领导人才在数量、素质和结构方面的发展目标,提出了实现这些战略目标的战略对策。它既有新颖的理论见解,又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对于科学地制定全国的、区域性的领导人才发展战略有重要参考意义。该项研究填补了我国领导人才研究和战略研究的一项空白。其成果达到了国内省内同类研究的领先水平。”基于上述评价,本课题成果荣获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颁发的“山东省干部工作新方法研究课题成果一等奖”。课题主要成果被采纳到省委组织部有关决策之中,取得了显著实效。据此,省社会科学规划管理办公室决定通过对该项研究成果的验收。

9.《略论邓小平的领导观》

1995年2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 my 的论文《略论邓小平的领导观》。文章提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领导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记录,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领导科学经典著作,集中地体现了邓小平的领导观。所谓领导观,是人们对领导这一社会现象的根本看法。它并不代替决策、用人、协调等具体的领导活动,但它是领导工作的灵魂,贯穿于领导实践的全过程。文章对邓小平的领导观作了如下概括:一是,“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唯一宗旨”,也是邓小平领导思想和领导活动的行为准则。二是,谁来领导?只能是“人民的公仆”。这是邓小平最为关心的问题。他一再讲:“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三是,领导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把主要领导力放在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是邓小平领导目的观的主要特征。四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邓小平始终着眼于发展,强调解放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眼于创造,强调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着眼于全局,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着眼于实效,强调抓住机遇,使用人才和方法的灵活性。

这篇文章受到广泛社会关注。《人民日报》发表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摘要播出。《新华文摘》1995年第4期在显著位置全文转载。1996年底,该文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省委书记赵志浩向我颁发了获奖证书。

10.《中国共产党执政50年的基本经验与启示》

这是我主持的199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执政50年的基本经验和历史启示》的成果,发表在《东岳论丛》杂志1999年第5期。(1)对党执政50年的基本评价是:党虽然有重大失误,给人民利益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一定的损害,但总的说,政权是巩固的,生产力获得较大发展,社会发展比较协调,人民比较满意,而且执政之路越走越远;执政是基本成功的,在世界执政历史上属于“比较好”的。(2)党管理国家政务的基本经验主要是:坚持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一条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适时改革,扩大开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社会的全面进步;必须不断地给人民以看得见的实际利益,最大限度地争取多数;建设过硬的人民军队和公安警察部队,保持强大的国防能力和政治威慑力;奉行自主和平的外交路线,努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3)党提高自身执政能力的基本经验主要是: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观;加强和善于学习;着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根据执政需要,改革和优化执政方式;从严治党,坚决同腐败现象作斗争。(4)党执政50年的历史启示是:关键是不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形成有权威的执政体系;根本问题是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以人的发展为中心,努力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素质;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努力吸取和运用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治理国家;解放思想,在创造性实践中增强党的执政力,而不是被动地“保天下”;努力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条件下执政的规律性,按照规律办事。

我始终注重把领导科学研究与领导实践紧密结合。研究领导科学的基础是领导实践。在山东社科院,我获得了一系列领导实践机会。1986年,我被任命为情报研究所所长。1991年初,调任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97年底,我辞去所长职务。之后,院里任命我为院长学术助理、山东省发展对策中心总干事,围绕省主要领导交办的课题进行研究,如《山东省第七次党代会主题研究》等。

1991年5月,我被下派到德州地区陵县,挂职县委副书记,直到1992年10月。主要任务是深入进行调研,研讨本县发展战略与对策等。这一年半,使我对基层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有利于自己的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离开陵县前,新任陵县县委书记魏学平征求我对县里发展的建议,我给他写了一篇《假如我当陵县县委书记》的文章,他很喜欢。后来,这篇文章在《领导科学》杂志上公开发表,获得很多县委书记的好评。

1986年12月,我主持创办了全国第一个省级青年领导科学学术团体——山东省青年领导科学研究会,出任研究会理事长。到1990年,研究会会员达500多人。在研究会独立存在的4年多时间里,朝气蓬勃地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学术活动,被誉为“山东省社会科学界一个最有活力、最有成绩的学术团体”。

1988年5月,我主持创办了山东省青年领导科学研究会的会报《领导科学报》。它融政治性、新闻性、学术性、知识性于一体,是迄今为止全国唯一一张领导科学专业报纸。1991年转由山东省社科联主管、主办,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指导,国内统一刊号CN37—0810G。

1988年,在成都举行的全国第三次领导科学学术讨论会上,我被选为新成立的全国领导科学学会筹委会副秘书长。1989年,成立中国青年领导科学研究会筹委会,我任筹委会主任。

虽然这些领导实践的舞台并不大,但对我的领导科学研究工作大有裨益。

新中国成立50周年时,《人民日报》1999年9月23日发表了 my 的《居安思什么》。文章提出,作为执政者,

必须懂得居安思危。仅仅停留在“思危”是不够的,还应当正确判断“危之所在”,思考和解决可能带来危险的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主要是思大势、思人心、思人才、思己过。从2000年起,这篇文章被选进北京市初中三年级上学期《语文读本》,社会反响较好。

二、改革开放是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深入研究改革重点与难点,才能实现社会进步的突破性进展

我进入山东社科院时,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不久,整个中国正起步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为立志“一切为了社会进步”的社科研究人员,决不能置身事外,定会投身于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研究改革开放,就是研究社会进步;推动改革开放,就是推进社会进步。在八九十年代,我围绕改革开放撰写了多篇文章。

1.《用马克思主义的改革观指导改革》

1987年撰写的这篇文章,针对当时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要搞好改革,从指导思想方面说,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改革观。“文化大革命”也讲“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但由于那个“改革”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错误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所以越改越糟。为了使改革保持正确方向,取得预期成效,有必要系统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改革观。主要是:(1)社会主义改革具有必然性。历史的辩证法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新陈代谢、除旧布新、由低到高、川流不息的过程,是一部不断进行变革的历史。社会主义实践一再证明恩格斯的英明论断:“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2)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依据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相适应的,不具有完整意义上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因此,“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同时,基本矛盾还有不相适应的一面,这就必然导致改革,即在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通过人们的自觉活动使社会基本矛盾通过非爆发的方式得到解决。(3)社会主义改革是自觉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重要形式。(4)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早日实现共产主义。(5)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形式是改良式的,非爆发式的。社会主义改革不是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也不是搞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而是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对具体制度的变革,不需要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制造任何震荡。(6)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条件,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二是共产党的领导。(7)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限度地调动全体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发扬民主,依靠群众。(8)社会主义改革是长期性与阶段性的辩证统一。经过改革,一项新的制度建立起来后,经过实践证明适合社会发展要求,就要稳定一段时间,而不能“天天改”。什么时候实践证明它开始阻碍社会进步了,再适时进行新的改革。

为了确保我国的改革始终置于马克思主义改革观指导下,第一,应系统地学习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改革观,学习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新的改革理论。第二,要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在改革实践中坚持正确的改革观。第三,发扬民主,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万不可鲁莽行事,靠“拍脑袋”进行改革决策。一切重大改革,都必须得到多数人的支持。第四,要注重研究改革的节奏与方式,十分注意转弯的过渡形式。第五,加强党的领导和政府对改革的控制力,决不能失控。

2.《为改革者“保险”》

历来的改革,都要触及一些人的

利益,引起一些人的反对;历来的改革,都是一种创新活动,蕴含着暂时失败的可能。担风险,是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同的社会环境下,风险会给改革者带来不同的命运。社会主义社会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自觉发展的社会。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是推动改革并能够保护改革者的,不应再制造改革者的悲剧。但在实践中,一些地方和单位,风险仍然严重威胁着改革者,使改革难以推行。为了动员更多的人参加改革,促进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清除改革道路上的障碍,排除给改革者造成的风险。所谓为改革者保险,就是通过排除改革风险本身,排除人们的风险感,增强人民改革的信心和安全感。这既要靠党和政府改革决策的正确,社会舆论对改革的支持,对改革失误的宽容,也要靠改革者自身善于审时度势,少犯或不犯错误。本文发表在《改革之声》杂志1986年第3期。

3.《论地方社会科学院所的改革》

作为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最关心的一项改革,自然是社科院自身的改革。1984年元旦,我给院党委、院长写了《关于改革科研管理制度的建议》。由于这是本院第一份改革科研管理制度的建议,院领导很重视,于1984年3月31日正式向全院各处、室印发,要求对该建议“进行认真讨论”。这份建议的核心,是“按照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重新确立我院的科研管理制度,最根本之点,是打破用行政方法管理科研的习惯,按照科研规律,实行科学管理。”具体说,就是“实行责、权、利相结合的科研责任制”,“实行以个人或科研课题组为单位的承包责任制”。之所以强调“以个人或科研课题组为单位的承包责任制”,是由精神产品生产的特点和规律决定的。每一项科研成果,都是从研究者个人头脑中产生出来的;只有把责任和权利落实到个人(或课题组),才最有利于出成果。为了建立责权利相统一的科研责任制,建议抓好五个环节:确定课题,签订合同,检查监督,成果鉴定,奖惩兑现。此外还提出六项保证措施。实践证明,这个改革建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85年初,在上述改革建议的基础上,我结合全国社科院的实际情况,撰写了《论地方社会科学院所的改革》一文。围绕地方社科院如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个核心问题,提出应重点解决三个问题:“一、按照社会发展需要确定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的合理结构;二、正确规定地方社会科学院所的社会功能;三、使地方社会科学院所逐步向半企业化和企业化转变。”并就此提出一系列构想。我首先把这篇文章寄给中共中央宣传部。1985年2月13日,中央宣传部理论局正式给我回函称:“建议中提到的三个方面都很重要,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参考。特此表示感谢!”红旗杂志社《内部文稿》1985年第5期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1985年5月21日《报刊文摘》摘发了本文的主要观点。

1988年,我围绕地方社科院的改革,撰写了《改革要动真的,改革才有希望》一文。提出,关键在于领导体制和人事制度的改革;以改革创建新的办院模式,成为党和政府的思想库、智囊团;以改革精神提高科研水平。

4.《重视国外对中国改革的研究》

这是我主持的1989年本院重点项目。一位著名社会学家曾写过一篇题为《我看人看我》的文章,给人的启发是,做一个社会的人不能闭目塞听,需要听取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反观自己,这有利于正确选择、修正、坚持自己的人生道路。其实,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这样。我们要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要在现代化大家庭中建设现代化,就不能闭关锁国,不能不研究别人对自己的评论和看法,必须在总体上采取一种对外开放的态势。这就需要研究国外对中国改革的研究。这个问题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国外对中国改革研究的主要观点,包括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

革和文艺体制改革,以及改革理论、改革实践的评价、认识、预测、建议等。另一部分是关于国外对中国改革研究的现状,包括研究人员的数量、质量、研究方向、研究重点及其发展趋势,以及研究机构设置的介绍分析等。很明显,前一部分内容是我们了解的重点,它直接引发我们的思考;但后一部分内容也不可忽视,它从宏观上反映了国外对中国改革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此外,了解国外学者对中国改革的研究方法,也有利于提高我国研究人员的研究水平。本课题引述、评论了大量国外学者对我国改革的观点,对我国正确推进改革,有重要借鉴作用。

5.《以革命精神推进机构改革》

本文受时任山东省委主要领导委托而作。部分内容发表在《人民日报》1998年4月2日和《人民论坛》1998年第1期。机构改革,事关全局。1978年以后,我国进行过三次较大范围的机构改革,但收效甚微,各级政府机构先减后增,人员编制得不到有效控制,政府职能也基本没有转换。机构改革没有走出“怪圈”有多方面原因,主要是:缺乏深入的科学研究;缺乏彻底的革命精神;缺乏有效的配套措施;缺乏牢固的法制基础。搞好机构改革的总体构想是:机构改革是“一场革命”,必须以彻底的革命精神推进机构改革;机构改革要有整体规划,分步推进;机构设置最高原则,是人民满意原则和社会管理有效原则;机构改革的直接目标,是建立健全五个系统——高度灵敏的信息系统,权威的健全的咨询系统,科学的多层次的决策系统,高效精干的执行系统,独立的强有力的监督系统。文章提出如下具体建议:从研究国外经验和总结自己经验入手,制定改革方案;职能相同或相近的部门合并,成立“大部”、“大委员会”、“大局”,同时根据新的工作建立一些新机构;政府管理跟社会管理分开,积极培育自我管理的社会组织;依照法律,坚持标准化,下决心整肃机构和人员编制;机构改革必须与机关人事制度、财政制度改革配套进行;机构改革应自上而下进行。文章强调,机构改革很难,但是这个关必须得过。过关的法宝有两个:一是革命精神,二是科学态度。

6.《寓党于政 党政合一——关于县级机构改革的建议》

1993年春天“两会”后,中央决定进行县级机构改革。我因为有陵县工作的经历,自认为有些新认识,便写了一篇《寓党于政 党政合一——关于县级机构改革的建议》。文章的主要观点是:本着中央提出的机构改革应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要求,目前县级机构的最大问题是党政两大系统的分离;县级是中国行政体系中最低一级地方政府,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因此在县一级可以不必党政两大系统分设,应该合而为一,主要领导干部可以党政一肩挑,职能相近的党政部门合并,党政两个办公室合并,组织部和人事局合并,宣传部和文化局合并等;鉴于法治社会建设,便于与国际接轨,合一后机构应以“政府”面貌对外,党组织应隐在政府内部,如同我们的军队领导机构一样;这个改革应该先行试点,如果可行就推广,如不可行,不搞就是了。

这篇文章后来被人民日报社的《理论参考》《中国行政管理》等10家报刊在显著位置发表或转载。

1996年中,我的研究报告集《发展与战略》出版。李春亭省长在给本书所作“序”中说,邵景均主持的数个山东省社会科学重点项目,“都是我省改革和发展中重大的、急需解决的问题。选题本身就很有现实意义”。“富于理论创新。文中多有独到的理论见解”。“应用价值较高。所提对策不少是有创见、又切实可行的。一些成果已经在实践中获得明显效益”。

1996年底,我终于拿到了研究员职称(我是1986年被评为副研究员)。1997年,通过省人事局评审,我获得了“国务院批准的政府特殊津贴”;通过省委宣传部评审,我获得了“山东省十佳理论工作者”称号。

(未完待续)